

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 卫龙宝 凌玲 阮建青

内容提要: 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利用 CGSS 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 村庄特征;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行动;一事一议

一、引言

农村公共产品涵盖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发展等领域,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均表明,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具有显著的贡献(樊胜根、张林秀,2003;世界银行,2004)。当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更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朱国云,2007)。然而,我国自2001年开始实施的税费改革,在地方政府收入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背景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这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主要来源,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处于更为紧迫的境地(徐志刚等,2009)。此外,在“新农村建设”推进过程中,“形象工程”层出不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性失衡矛盾异常突出。针对上述问题而实施的“一事一议”制度,旨在通过村民自愿、民主决策的形式筹资筹劳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尽管这一制度安排的初衷在于通过村民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产品需求,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杨丹、章元,2009)。但是,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建立在较好的村民自治和完善

的民主参与及民主决策机制基础上,并需要村民在“近似一致性同意”的决策规则下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然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于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致使村民参与普遍不足,使得“一事一议”制度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筹资交易成本高、供给效率低。张克中和贺雪峰(2008)认为我国目前成功地进行“一事一议”的农村不及全国农村的10%。也就是说,村民有效参与的不足已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持续增加和效率提高的一大障碍。

在现有制度环境与发展要求下,如何有效促进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为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供求失衡的关键所在。其中,由于我国农村地域的差异性和村庄的异质性,识别和探索出村庄特征中那些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无疑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现有文献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案例分析方法提出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也有少数实证研究检验了这些影响因素,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个案的观察或者采用特定区域

*项目来源: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全国十县百村实证研究”(编号: 08& zd013)、浙江大学 CARD 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论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数据进行验证。本论文在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下,采用来自全国范围的村庄调研数据,从村民参与的角度

探索村庄特征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为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与实践进展

实际上,由社区内居民共同参与供给公共产品本身是一个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有关集体行动的理论,早期学者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必然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然而,这并不完全符合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并未形成集体行动的实际情况。对此,Olsen (1965)给出了新的解释:因为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可能存在冲突,而且形成集体行动需要一定的组织成本,这会阻碍集体行动的形成;也就是说,要使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达成集体行动,需要集体中人数较少,或者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Olsen的观点激发了人们对集体行动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讨论,但他却忽视了群体成员在长期博弈过程中可能被一些潜在或隐形的因素约束或激励而减少公共产品供给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形成集体行动(陈万灵,2002)。这些潜在的因素在随后的研究中逐渐被概念化、具体化。例如,许多研究指出,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交流可以很好地促进彼此间的合作,从而达成集体行动(Daves *et al.*, 1977; Anderson *et al.*, 2004; 刘伟, 2009)。

Olsen的集体行动逻辑及随后的研究为人们探讨社区内集体行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许多有关国内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案例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农村社区集体行动形成进而促进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其中较为著名的是Ostrom (2000)利用公共池塘为例的研究,当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规范存在时,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村庄已有的社会资本能达成村民之间的合作,促成集体行动的形成,从而比强制性或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更有效。贺雪峰(2002)提出“社会关联度”概念,指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即在解决村庄秩序问题时村民有多大可能形成集体行动。贺雪峰和

罗兴佐(2006)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具有强社会关联度的村庄,集体行动的达成要求村庄规模不能太大,且小规模群体内部具有强大的向心力、道德感及流动性不高等条件。相对于Ostrom的社会资本概念和贺雪峰的“社会关联度”,陈英楠(2006)认为包括村民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影响了村民的成本—收益比较,可以促进集体行动,较好地解决合作问题。刘永功和余璐(2006)指出村庄的团结程度直接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上述研究表明,从村民参与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突破了传统研究中主要关注外在条件约束的局限性,将研究视角聚焦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主体上,从而有可能对实践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在我国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涌现了许多能够验证上述理论的案例,其中发生在湖北省鄂州市英山村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①。

英山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意识到村民参与的重要性,在新农村建设项目实施之前就在村和各村民小组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德高望重的村民为主要代表的村民理事会,并制订了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凡是涉及到村组建设的事务均由村民理事会提出议题、酝酿议题、表决议题、公示议题进行民主决策。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促进村民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程序中。在这一制度安排下,经村民理事会和村民充分讨论形成的新农村建设规划得到了全村村民的支持。因而该村公路建设、厕所改造等多项公共工程在村民的参与下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供给。

虽然基于村民参与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深度,相关的实践也在现实中不断涌现,但是相应的实证研究却非常缺乏,这不仅阻碍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

^① 该案例资料来自:李川,龚雪.湖北新农村建设典型报道(9)——鄂州市鄂城区英山村.新浪网 2009-08-28 <http://news.sina.com.cn/c/2009-08-28/180516202712s.shtml>

理论对现实的指导缺乏根基。本文在已有理论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采用来自全国范围的村庄调研数据,从村民参与的角度检验村庄特征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因

而,本文的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重要拓展,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从本文研究中得出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实证分析

(一)分析框架与待检验假设

除了上文所指出的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从而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外,另一些研究还提出了其他可能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概况来说包括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非农化程度、村庄集体收入等(彭长生、孟令杰,2007;高鉴国、高功敬,2008;周密、张广胜,2009)。

总体而言,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村庄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村庄经济发展程度。已有研究主要从村庄社会关联维度解释村庄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基于宗族、血缘、亲缘的关系是村庄社会关联的主要内涵,但是村庄规模、村庄居住密度等外生性村庄特征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交往网络,从而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形成。因而,可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大致分为村庄规模、村庄密度、村庄社会关联、村庄集体经济和村庄经济结构五类因素,其中前三类因素通过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进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图1形象地表达了以上思想,也是本研究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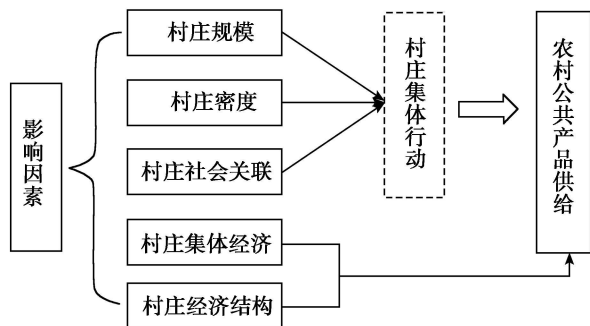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从分析框架中可以推出本文待检验的三个假设:(1)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影响,规模越大则越不容易形成集体行动,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越弱。(2)村庄密度对村民参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影响,村庄聚集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从而促进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3)基于村庄宗族结构的社会关联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影响,村庄姓氏越集中,越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从而促进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二)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村)问卷”,该问卷的调研对象是村支书或村主任,调研主要围绕有关村庄地理特征、人口特征、财务信息等内容展开。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6个省份的100多个县份进行。调查时间为2005年9—10月。

税费改革后,“一事一议”制度替代了原有通过固定向村民收取乡统筹及村提留的办法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形式,因而,本文中选取“一事一议”筹资款作为衡量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指标,即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1)村庄规模,结合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村庄规模体现在村庄户数和村民小组(自然村)数两个层次上;(2)村庄密度,选取村庄每平方公里户数作为村庄密度衡量指标;(3)第一姓氏占总人口比例,这是反映村庄宗族结构的变量;(4)户均村级收入,用村庄财务收入中扣除“一事一议”款项之外的其他收入除以户数进行衡量;(5)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这是反映村庄经济结构的变量。

本文选取样本中“一事一议”筹款大于零的村庄,共68个观察值。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从表1中各个变量的统计特征来看,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变异程度较高,这样能较好地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 变量 | 单位 | 均值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标准差 |
|------------|--------|--------|--------|----------|---------|
| 户均“一事一议”筹款 | 元/户 | 854.23 | 10.87 | 7575.76 | 1148.83 |
| 户数 | 个 | 561.71 | 120.00 | 1840.00 | 335.60 |
| 村民小组数 | 个 | 11.25 | 1.00 | 30.00 | 6.86 |
| 村庄密度 | 户/平方公里 | 117.35 | 2.30 | 344.00 | 90.45 |
| 第一姓氏占比 | % | 40.23 | 3.00 | 96.00 | 23.85 |
| 户均村级收入 | 元/户 | 797.55 | 0.00 | 16000.00 | 2007.37 |
| 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 | % | 45.51 | 0.00 | 96.00 | 23.64 |

(三) 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 OLS 估计法, 选择不同的自变量组合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在一个村庄中, 户数与村民小组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所以回归中没有将这两个变量同时放在同一个模型中, 而是分别将它们与其他解释变量组合; 此外还单独将村庄密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最终共形成了 9 个回归模型, 表 2 是回归结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 在模型 1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中户数都非常显著地负向影响了“一事一议”筹款。同样地, 在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中村民小组数也都非常显著地负向影响了“一事一议”筹款, 这表明村庄规模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村庄密度无论是单独分析还是与其他变量组合分析均显著地正向影响了“一事一议”筹款。而第一姓氏占比虽然有正的影响, 但并不显著。人均村级收入和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对“一事一议”筹款分别有正向和负向影响, 也均不显著, 这一结果与彭长生和孟令杰 (2007) 的发现有所不同。

(四) 讨论

1. 村庄规模对“一事一议”筹款存在负向影响。户数或村民小组数越多, 户均“一事一议”筹款却越少, 其所代表的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应更弱, 这与本文假说 (1) 一致。Olson (1965) 的集体行动理论为这一结论提供了较好的解释: 户数越少的小规模群体形成集体行动所需要的组织及协调成本越少, 有助于减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更能促进村民参与。此外, 在我国大部分农村, 同一

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内部村民一般比较熟悉, 这种熟人社会特质基础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更容易建立信任, 从而达成供给决策的一致; 而村民小组之间往往属于不同的小集团, 一个行政村如果要形成公共决策需要征得这些村民小组的同意, 根据集体行动理论, 村民小组数越多则越难形成一致意见, 利益分化和意见分歧致使他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很难形成集体行动。

2. 村庄密度对“一事一议”筹款存在正向影响。村庄密度越大, 每平方公里户数越多, 表明村庄越聚集, 户均“一事一议”筹款更多, 这与本文假说 (2) 一致。实际上, 越聚集的村庄, 村民之间的沟通越方便, 村庄熟人社会特质更明显, 基于信任或其他因素的激励与约束也就越强, 村民之间的合作自然也就容易达成, 从而在公共决策与建设中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供给公共产品, 这验证了 Dawes 等 (1977) 提出的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观点。

3. 第一姓氏占比对“一事一议”筹款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基于村庄宗族结构的社会关联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并无明显影响, 这与彭长生和孟令杰 (2007) 的研究发现以姓氏衡量的村庄特征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程度较弱一致。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结论并不表明村庄社会关联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无关。贺雪峰和胡宜 (2004) 将社会关联度划分为现代型社会关联和传统型社会关联, 前者是指经济社会分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契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 后者是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社会关联。第一姓氏占比所代表的是宗族这一传统型的社会关联, 这种传统型的社会关联随着现代人口的频繁流动和技术发展的冲击而作用逐渐淡化 (张林秀等, 2005), 使得血缘关系在一个村庄中已不再是维系村民关系的唯一纽带, 基于这种关系的社会关联逐渐被现代型关联取代, 也就使得这一指标很难衡量村庄的团结性或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结论正好印证了贺雪峰和罗兴佐 (2006) 所提出的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形成的难易要求村庄内部的流动性不高的观点。对于现代型的社会关联是否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显著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户均村级收入、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对“一事一议”筹款无显著影响。户均村级收入的回归系数为正,表示村集体经济对“一事一议”筹款有正向影响,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的回归系数为负,表示村经济结构对“一事一议”筹款有负向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均不显著。这与已有研究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第二、三产业比重越大的村庄,“一事一议”筹款越多,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的观点不

大一致。实际上,经济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并不代表村庄的团结度或者凝聚力越高,这些地区村庄内利益集团的分化往往比较严重,很难形成集体行动,“一事一议”筹款及公共产品供给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这些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往往有更多的渠道,比如捐赠等,“一事一议”筹款的作用有可能被淡化。

表 2 模型实证结果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模型 6 | 模型 7 | 模型 8 | 模型 9 |
|-----------|----------------------|---------------------|--------------------|--------------------|--------------------|----------------------|---------------------|---------------------|---------------------|
| 户数 | -0.561 (2.17)** | | -0.671 (2.26)** | -0.672 (2.33)** | -0.696 (2.27)** | | | | |
| 村民小组数 | | | | | | -58.321 (2.16)** | -54.429 (1.98)* | -56.261 (2.12)** | -65.941 (2.11)** |
| 村庄密度 | | 2.635 (1.97)* | 2.987 (2.08)** | 2.985 (2.06)** | 3.227 (2.13)** | | 2.242 (1.73)* | 2.202 (1.72)* | 2.488 (1.85)* |
| 第一姓氏占比 | | | 0.116 (0.02) | 0.145 (0.02) | 0.684 (0.10) | | 1.859 (0.29) | 2.331 (0.34) | 3.260 (0.50) |
| 人均村级收入 | | | | 0.005 (0.04) | 0.001 (0.01) | | | 0.078 (0.69) | 0.087 (0.82) |
| 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 | | | | | -6.544 (0.91) | | | | -10.513 (1.28) |
| 常数项 | 1154.432 (4.69)** | 529.975 (3.71)** | 861.117 (1.91)* | 857.714 -1.64 | 1119.523 -1.45 | 1479.033 (3.61)** | 1097.824 (1.79)* | 1058.462 (1.61) | 1564.632 (1.58) |
| 观察数 | 68 | 68 | 68 | 68 | 68 | 68 | 68 | 68 | 68 |
| R-squared | 0.03 | 0.04 | 0.08 | 0.08 | 0.10 | 0.11 | 0.14 | 0.14 | 0.19 |

注:采用稳健性检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集体行动理论出发,利用2005年CGSS村庄数据分析了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主要结论有:

(1)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负向影响。(2)村庄密度与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正向相关,村庄越聚集,村民越容易参与公共产品供给。(3)基于村庄宗族结构的社会关联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存在显著影响。(4)村集体经济及经济结构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

本文前两项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也即可以通过促进村庄的集聚提高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合并村

庄办法,减少村民小组数;另一方面,村庄发展适度聚集化,扩大村庄密度。这样既可以减少以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为主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于村庄分散而增加的供给成本,又有利于村民之间沟通交流,降低公共产品供给在“一事一议”过程中的协调组织成本,促进村民形成集体行动,共同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村民参与基础上的农村公共产品更符合村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自上而下”供给所造成的“形象工程”问题,缓解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突出矛盾。而这一实践已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展开并取得较好成效。也就是说,通过激励村民,诱致而非强制促使村民形成集体行动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有效结合,是提高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长久之计,也是当前“一事一议”制度的应有之义,这对构建和谐、稳定的新农村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樊胜根, 张林秀. WTO 和中国农村公共投资.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2. 世界银行. 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 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3. 朱国云. 多中心治理与多元供给——对新农村建设中公共物品供给的思考.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4. 徐志刚, 刘明兴, 刘永东. 农民组织对村庄公共融资的影响: 掣肘还是助推? ——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农民负担变化的启示. 经济学(季刊), 2009(4)
5. 杨丹, 章元. 选民需求的异质性与公共品供给: 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中国农村观察, 2009(5)
6. 张克中, 贺雪峰. 社区参与、集体行动与新农村建设. 经济学家, 2008(1)
7. 陈万灵. 社区研究的经济学模型——基于农村社区机制的研究. 经济研究, 2002(9)
8. 刘伟. 群体性活动视角下的村民信任结构研究——基于问卷的统计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2009(4)
9. 贺雪峰.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
10. 贺雪峰, 罗兴佐.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 经济学家, 2006(1)
11. 陈英楠. 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以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为例.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增刊)
12. 刘永功, 余璐.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13. 彭长生, 孟令杰.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 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14. 高鉴国, 高功敬.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 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社会科学, 2008(3)
15. 周密, 张广胜. “一事一议”制度与村级公共投资: 基于对118位村书记调查的经验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09(1)
16. 贺雪峰, 胡宜. 村庄研究的若干层面. 中国农村观察, 2004(3)
17. 张林秀, 罗仁福, 刘承芳, Scott Rozelle. 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经济研究, 2005(11)
18.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9. Daves R.M., Tavish J.M., Shkleer H., Behavior, Communication, and Assumptions about Other People's Behavior in a Commons Dilemma Sit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7, 35(1)
20. Anderson L.R., Mellor J.M., Mijyo J., Social Capital and Contributions in a Public-Goods Experi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2)
21. Ostrom E.,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3)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杭州, 310029)

责任编辑: 方静

The mode of "husband outside and wife domestic" had changed the rural remaining wives' labor supply patterns; they had lower reservation wage, higher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longer working hours, which all showed that their labor supply behavior was closer to the description of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of the female labor supply. The rural remaining wives' labor supply mode was beneficial to their own wage growth and the husbands', the total family income increase ha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ort-term economic situation improvement. However, this labor supply mode heavier the rural remaining wives' burden of family affairs, wage work and agricultural labor, which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long-term welfare of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The role conflict of the rural remaining wives led to the unbalance of the interests in the family, which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rural area was lack of effective market and social ways to change the short-term income into long-term benefits.

Study of the Impact of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Based on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WEI Longba, LING Ling and RUAN Jianqing (48)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Villagers participate in supplying the village public goods. Then, using CGSS village-level survey data, we tested the hypotheses in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llage scal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Villagers participate in supplying the village public goods. On the contrary, the village dens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he clan-based relationship of traditional society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Villagers participate in supplying the village public goods.

A Study on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 for Return-start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Survey Data about 1145 Return-migrant Workers in Jiangxi Province CHEN Zhaojun and ZHU Honggen (54)

This paper mad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human capital and the social capital on migrant workers acquiring the government support about return-start businesses by ordered logistic model based on 1145 survey data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igrant workers age, education level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condition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on the 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cquiring the government support. The expenditure of phone, the numbers of contacting friends, the numbers of borrowing people as the weak relations network influence dramatically on the 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cquiring the government support, while the spouse and the brother-sister are not important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is also major factor.

Reflections on the Quality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ZHANG Lijian and HU Yujiao (60)

Based on describing the progress of quality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dern biotechnology and the "Clean Agriculture" in the quality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iscussed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on further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quality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spection and testing techniqu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nd other aspects of works.

Research on Pig Producers' Income Fluctuation Based on Frame of Vulnerability Analysis ZHOU Faning, LIU Qingquan and PAN Guoyan (64)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Strategies on Forestland Usufruct Transfer among Households KE Shufu, LI Zhou and ZHAO Tiezhen (71)

The paper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cost and benefit level of the behavior decision of forestland usufruct transfer for households. Base on the mechanism of households' behavior and the framework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the three key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the transfer for households and society were analyzed in this research, i.e. the forestland income level for the transferees.